

# 高怀远致一脉相承，气魄胸襟非岳武穆不能

## 从岳飞衡阳大营驿题壁看《满江红·怒发冲冠》之真伪

甘建华

随着电影《满江红》的热映，岳飞这个中国历史上金光闪闪的名字，再一次被人们传颂。而有关《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脍炙人口之作的真伪，也成为激烈的学术论争。

我原本部分倾向于著名古文献学家余嘉锡提出的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的观点，因为岳飞被昏君奸臣合谋杀害多年以后，其子岳霖、其孙岳珂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四处搜罗岳飞生前的诗词文章，“毕其心力”编撰《鄂国金佗粹编》及《鄂王行实编年》，可二书都没有收录岳飞本人最重要的作品《满江红·怒发冲冠》（他另有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岂非咄咄怪事？而这首千古绝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诗词之一，甚至重铸了历代国人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气象，抗战期间更是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慷慨奔赴国难。

倘若结合岳飞留在湖南衡阳大营驿的题壁文字，我会更加赞同《岳飞传》作者邓广铭的观点。在这位著名宋史学者看来，岳飞具有创作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的才能，之前诗文屡见词中之语，《全元戏曲》卷十一《岳飞破虏东窗记》即有唱词改编，明代前期汤阴、杭州两地岳庙已有此词石刻。还有两个特殊原因可以认定此词为岳飞遗作：一是非岳飞的胸襟气魄不可能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二是这首词很好地代表了岳飞的爱国情怀，已与岳飞的光辉形象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就像红学泰斗周汝昌所说：“不思作伪者大抵浅薄妄人，笔下能有如许高怀远致乎？”

我最初知道大营驿这个地名，是在衡阳市人民政府1986年编印的《衡阳市地名志》一书中，祁东县“大云市”词条如是说：“大云市，集镇名。在祁东县城西10公里，为大云市乡人民政府（今已并入双桥镇）驻地。因旧时当官道，曾设驿站。南宋名将岳飞统率大军驻营于此，因名大营驿，后演变为大云市。有合（铺）面街道，长约300米，人口约330。镇中设有圩场，附近盛产茶油、茶叶。镇侧原有金沙（山）寺，寺内原有岳飞《题大营驿壁》石碑，为明散文家唐顺之之父（唐瑄）官永州时所勒，顺之为文以记其事。”词条还提到有不少旧时文人题咏石刻，均与岳飞事功及遭遇有关，如祁阳县令李树谷有句云：“两河战胜利非我，三字狱成事在天。泪洒湖湘千里，神驰沙漠万重烟。”又邑人周慎轩有句云：“十年尘土功无比，半壁河山愤不平。都鄙至今祠畔树，虬枝都作向南横。”可惜石碑都已湮佚，难以复寻。1992年版《祁东县志》“大事记”亦云：“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岳飞破曹成，返回中，在今祁东大云市（亦称大营市）题壁抒怀，后人于此兴修岳圣殿，



▲沟渠边的宋武穆岳公忠义碑。甘建华供图

以作纪念。”

“营”和“云”两个字，在衡阳、祁东方言中都念“云(yún)”，因而出现各种文本的“大营”与“大云”之说，本文从《鄂国金佗粹编》之说，统称大营驿。2020年7月11日与2021年6月5日，我曾偕友人两度游览大营驿，皆因读近人周策纵《大营市》一文而感兴趣。周姓是当地的名族，周家是民国时期的名门，周策纵本人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兼历史系终身教授。他家竹山湾离大营市很近，大概只有一公里左右，旧时铺的是一条青石板窄路，现今已有宽敞畅通的马路。

大营驿街圩场还在，但人口不多，大都乔迁县城或其他地方去了。我们在街上漫步时，随便问一个当地人，男女老少都知道岳王岳飞，都知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都知道岳飞曾驻兵大营驿，年高识字者甚至知晓曹成其人。而岳飞能来到当时偏僻的南荒大营驿，的确与宋史中的一代枭雄曹成有关。

《岳飞传》中曹成被写成“逆贼”“流寇”，记得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但知道《说岳全传》中岳飞麾下猛将杨再兴的肯定不少，他曾试图单骑擒拿金兀术，失败后仍能单骑而还。话说这杨再兴原是曹成部将，后来降于岳飞，可见曹成也非等闲之辈。

曹成是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因杀人投军，跟随名臣宗泽参加过第二次开封保卫战。靖康之变（1127年）后，曹成树起抗金大旗收拢溃散军兵，被推举为“中华盟主”。绍兴元年（1131年），曹成接受朝廷招安，被封为荣州团练使、知郢州。他带领十余万大

军驻扎攸县（今湖南攸县），拥兵自重，不受节制，祸乱一方。翌年正月，朝廷任命都统制岳飞为权知潭州（今长沙）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前往讨伐侵扰湖南、两广的曹成。岳飞先向曹成晓谕上意，劝其投降，可曹成执意不从。经过数月鏖战，岳飞大败曹成于全、桂、贺、连诸州，曹成败走邵州（今湖南邵阳），最终接受韩世忠招安。

岳飞得胜班师，率所部八千余人马，仍往江州（今江西九江）驻防，守卫长江中游。当年七月初，大军经过湖南邵阳（1952年4月25日，祁阳县析置祁阳、祁东二县，大营驿属今祁东县双桥镇），岳飞写了一则日记，题于大营驿墙壁上，其文曰：“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

这篇文字非常清楚地表明，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的岳飞，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忠君爱国的思想已经深入其灵魂之中，因而后来《满江红·怒发冲冠》的问世，实乃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便平定了流窜湖广的“曹贼”，也只是荡平“蜂蚁之群，岂足为功”，其夙志乃“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

然而，古代臣子本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恰巧触痛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敏感神经。须知赵构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为

金兀术掳走了“二圣”（父皇徽宗和皇兄钦宗），倘若真的“两宫还朝”，高宗的龙椅还坐得稳吗？所谓“宽天子宵旰之忧”，其实只是岳飞的一厢情愿罢了。封建社会的君王向来刻薄寡恩，靴中藏刀的高宗更是如此。既然岳飞口口声声要“扫清胡虏，复归故国”，兼之手握十万雄兵，“岳家军”只知有岳不知有赵，为了防止其尾大不掉，对不住了，岳鹏举大元帅，朕只能用十二道金牌，将你从朱仙镇前线唤回，且借宰相秦桧的东窗巧计，怕你不入我彀中。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1142年1月27日），岳飞受“拉肋（猛击胸肋）”之刑（一说为饮鸩服毒），在大理狱中遇害，享年39岁，供状上只留下八个字的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早在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大书法家文徵明因睹“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即从皇帝对待岳飞前倚后酷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发现问题，对这位千古英雄的悲惨下场异常悲愤，于是作一首《满江红》借词寄慨：“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欲！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岳飞之死令人始终无法释怀，每当想起必定义愤填膺，成为一个绵延千载、敬仰与痛恶兼具的热门话题。

岳飞大营驿题壁文字收录在《鄂国金佗粹编·卷十九》及《岳王家集·卷十·公

跋》。我来游大营驿时，关岳殿与几尊塑像已毁于“文革”劫难，但民国五年（1916年）出生于斯的周策纵在《大营市》中记载：“岳飞驻扎以后，过了许多年，大营市修了一所官殿式的房子，里面有两个并排的殿，一个是岳飞的殿，另一个是关公的殿。关岳殿的瓦都是金碧辉煌，殿前大红柱子要有两人才能合抱那么大。地上铺着很好的烧砖，墙壁都是粉漆的。岳飞的殿里有岳飞的像，比实际的人要大好几倍。他是白脸，好像有些胡须，端坐在帐里，一边站着他的儿子岳云，另一边站着他的部将张宪。岳云手里捧着一颗用布裹着的印，张宪手里拿着一把刀，他们也比实际的人高大很多。”

《大营市》中还写到，岳飞正殿对面有一个碑亭，里面竖着许多高大的石碑，有些碑文是讲岳飞事迹的。“碑亭前面，有两个木栏杆拦起来的小方形框框，有点像牢狱似的，里面跪着两个石头刻的像：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秦桧的妻子。”根据周策纵的记忆，“大营市的关岳殿和连在后面的金山寺，都建筑在一个小山坡上头。”

如今这两处建筑早已圯废，改造成了一所敬老院。但两个大殿对面的二层楼戏台还在，将要坍塌的戏台前仍然有着大片空地，几棵香樟树绿意葱郁。

经当地几位周姓老翁指点，我们在离古戏台几百米远的另一条街上，在一户做豆腐的谢姓人家房后，见到了沟渠边一块清代石碑，上镌《宋武穆岳公忠义碑》，用水稍稍清洗，“权湖南帅岳飞……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等字清晰可辨。碑左另有一篇《附题广德军金沙寺壁记》：“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三日，河朔岳飞题。”建炎四年是公元1130年，时在岳飞征剿曹成之前。碑刻落款时间：“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仲冬月廿旦。”距今已有239年之久。结合大营驿题壁“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这篇文字同样彰显了岳飞“天日昭昭”之心。因而再去争议《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不是岳飞所撰，似乎已经设置了多少实际意义。岳飞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早就断言：“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

近年两番赴大营驿访古观碑，古碑都一直躺在那儿，成了寂寞无主之物。今年是岳飞诞生920周年，又值电影《满江红》爆红，不知这块铭记伟大民族英雄史事的碑刻，能否尽快保护起来？

# “文学帮助我们恢复记忆，也让我们更加阔大和宽容”

邵丽

前年我出版了《金枝》上半部，为此写了不少的创作谈，可是每次谈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自己都很诧异。可能因为我写创作谈时既有写作的初心，也有出版后我回望作品时那种复杂的心态吧！总之，很难一言以蔽之。

其实在内心里，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梗在那里，它会持续发酵，让我寝食难安——有些事情我没全面表达出来，或者犹豫是否要说出来。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源自上周村的这个周氏家族，在肉眼可见的几十年里，尽管出了不少的官僚、干部、艺术家，但却是靠一个大大不识字的女人黏合在一起的，她就是作品的女二号拴妮子。所以踌躇再三，我写了作品的下半部。上部发在《收获》，下部在《当代》发表，起名《当归》。在这部作品里，终究是让拴妮子站了起来，还她以地位和尊严——尽管地位这个词于她而言是一个阔大的奢侈品，但我觉得她配得上。

写家族历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毕竟很多人容易对号入座，很多事情因为禁忌而被刻意收敛。曹雪芹所谓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道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但远远不是全部。比如我五六岁的时候被父亲扇那一巴掌，他的那手一辈子都没从我脸上挪开过，我们俩从来也没真正和解过。那是一个人的痛，一个家庭的痛，也是一个时代的痛。再一个，穗子离婚不离家的坚守，是插在两个家庭之间的一根刺，几十年里都拔不掉。可当物是人非，我们回首再去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她无非是延续和传承了家族女人的这种宿命。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让周家人的“家族”概念有了真实而具体的物理形态，也让他们最后对土地的回归有了明确而温暖的指向。

我试图通过对家族历史的梳理

寻找生命的原乡，但兜兜转转，最终

发现一切都始于土地，也归于土地。

我的先辈们那么义无反顾地冲出家

庭，走出故土。但最终，他们的后人

却以另一种自觉的方式重新回归土

地——土地是中国人的文化乡愁，

也是他们牵牵绊绊、始终难以真正

打开的心结

也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这些年的创作更多地深入到家庭话题，父亲、母亲、祖母……这主要源于父母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我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个时代既翻云覆雨又波澜壮阔。我在那个时代里出生、成长、恋爱、结婚，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时代。当我们回望那一段岁月，不管曾经怎样伤痕累累，也依然有难能可贵的温馨和失而复得的理解。我想，这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它既帮助我们恢复了记忆，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阔大和宽容。所以讲述父亲、母亲，还有祖母以及这个家族，于我而言有了一种打探历史的隐秘快感，也有一种直面历史的痛感，也许这



就是向历史致敬的真实含义吧。我们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父母母亲以及各色人等，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油然而生的悲悯。

每当我写父亲这个人物的时候，总觉得他是一个指代，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他更像一个象征。那个时代大部分家庭的父亲都跟他差不多，嵌在时代的夹缝里，谨小慎微，动辄得咎。但我的父亲之所以更具代表性，是因为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自婚姻到事业都发生了“革命”。如果从乡村的、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他是一个成功的旧社会的脱逃者。但脱离开功利导向去审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虽然他一生谨慎，但是因为家庭复杂关系的影响，他几乎没有逃脱任何一次运动的冲击。可以想

见他在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心里折磨。他所勉力维护的，比如他身后的两个家庭，后来都成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选择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矛盾抛给了妻子，甚至还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然而他在其中的转圜，很难用对错来评价。但是父亲的躲闪，客观上造成了家庭之间的阻隔和对孩子们心灵的戕害。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难尽。拴妮子的得寸进尺，我的睚眦必报，都是我们在这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中所汲取的成长养分。所以这段看起来咬牙切齿的历史恩怨，更具有了冰冷的时代所特有的情感特征。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

父亲身后的历史纵深，是很难被看透和书写的。甚至往更深处讲，从曾祖父到我的子女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恰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平行。时代风云瞬息万变，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都因各种缘由离开了家乡与原配妻子。除却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与父亲皆是无可争议的忠诚的革命者，一生的命运与政治相关联。而他们背后的那些女人们，却靠自己超乎常人的忍耐和坚韧，延续着家族的香火。这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细想起来却惊心动魄。那毕竟是几个鲜活的生命啊！对于她们，可以作跌宕起伏的宏大叙述，也可以作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但毕竟我身处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总是让我难以独善其身，思维和情感也很难波澜不兴。所以我觉得，即使我尽量避免在作品里有偏颇的态度，但毕竟在爱与恨、生与死的两个维度之间，很难有客观的取舍。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还是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做出了

努力。

作品里的两个母亲，朱珠和穗子，我觉得给予她们的笔墨太少。但母爱就是这样，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既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无从谈起。但它又是世俗的、具体的。朱珠自从嫁给丈夫，就心无旁骛，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维持着这个家庭的日常。即使她在知道她还有一个前妻和女儿，而前妻还固守在老家离婚不离家时，也只能顺从现实，按照丈夫的意图一丝不苟地打理这个家庭与那个家庭的关系，一生都不曾抱怨过。但恰恰是这种平静所造成的敬侧，让我们心里格外难以平衡。而穗子的悲剧更令人欲言又止，她从嫁给丈夫的那一天起就在抗争，而命运不公给她带来的苦果，虽然在岁月的流逝中并非触目惊心，但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承受。她都默默吞下了。坚韧和煎熬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命运标签，但最后的功德圆满也未必是对她们的馈赠和赞许。

其实说到底，我和拴妮子不过是一体两面。所有的进退得失在水落石出之后，更让被岁月过滤纯净的亲情具有了永恒的意味。面对着汹涌而至的命运洪流，艰难的泅渡也是以各自的方式渡劫，会有侥幸逃脱的欣喜，也有灭顶之灾的哀鸣。所以抛却家庭和己一己的情感，我觉得唯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值得我们深深地挖掘和体味。

在作品里，我试图通过对家族历史的梳理寻找生命的原乡，但兜兜转转，最终发现一切都始于土地，也归于土地。我的先辈们那么义无反顾地冲出家庭，走出故土。但最终，他们的后人却以另一种自觉的方式重新回归土地——土地是中国人的文化乡愁，也是他们牵牵绊绊、始终难以真正打开的心结。所谓乡土中国，此之谓也！